

经济文化丛书

日中两国 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

〔日〕依田意家著 叶坦 蒋松岩译 紫雪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经济文化丛书》

主 编 喻 镭 丹 沈 华 嵩

副主编 叶 南 奇 叶 坦

总 序

文化现象常常瑕瑜互见。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出现过的一股“文化热”，使人们从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争论中冷静下来，思考了很多问题。

早在70年代，人们已经开始不满足“西方化”的“现代化理论”，即“经济增长第一”的现代化模式。同时，某些新的“发展哲学”和“发展理论”也骤然剧增。这些发展模式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即从“纯经济型”的增长观念过渡到以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增长观，并更加强调“文化价值”的关键作用和文化模式的多元化。

而新的“发展理论”之更为直接的观察重点，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成功地实现现代化这一举世瞩目的事实。许多西方学者把“亚洲四小龙”成功的根源更多地归结为它们具有的共同儒家文化背景，这些国家和地区被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虽然“儒家动力说”或“儒教资本主义”还颇有争议，但有一点没有疑义，即人们应该在现代化问题中更多地考虑文化层面，并去发现经济增长和文化伦理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经济文化丛

书》的目的，正是为了促进这种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更好地研究和运用。

目前很难为经济文化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是经济文化既不是关于经济的文化学，也不是文化经济学。它力图把经济和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研究，并去考察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之间水乳交融的内在联系。以经济与文明交融实现现代化为例，欧美国家是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文明交融，则东亚国家是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文明、东方伦理文明交融，而当代中国将现代化与中国式文明交融。这里，文化背景与经济具体发展道路都有明显的特殊性。所以经济文化如果能形成一门学科，必然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它将涉及众多的学科知识。如果这套丛书能够促进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得以确立，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人们不时在问：文化问题还会再“热”起来吗？马克思曾说历史重复的两次，第一次是悲，第二次是喜。如果经济文化“热”起来，那么，经过反复和沉思后对文化问题的理解，肯定更加成熟和透彻，为振兴国家经济的中华文化的复兴和重生将是不可避免的。

丛书主编 1993年12月12日

目 录

译 序	1
前 言	9
第一章 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论	12
第一节 日本传统的经济论	12
一、江户时代的重农论	16
二、江户时代的抑商论	17
三、江户时代的贸易无用论	18
四、关于江户时代的经济论	25
第二节 中国传统的经济论	
——以刘锡鸿为中心	28
一、刘锡鸿其人与其社会背景	29
二、刘锡鸿的经济论	34
第二章 传统经济论的崩溃	40
第一节 日本传统经济论的崩溃	40
一、肯定商业的思想	41
二、专卖论	47
三、作为经济主体的藩	50
四、幕末的贸易振兴论与商业立国论	52
第二节 中国传统经济论的崩溃	56
一、林则徐	56
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64

第三章	变革时期人民斗争的经济要求	77
第四章	“洋务派”时期的经济论	81
第一节	日本“洋务派”的经济论	81
第二节	中国洋务运动的经济论	90
一、	洋务运动中“官方”的经济论 ——张之洞	90
二、	洋务运动中“商界”的经济论 ——郑观应与马建忠	99
第五章	明治初期的官业论与民业论	107
第一节	明治初期的殖产兴业政策	108
第二节	明治初期的产业民营论	115
第三节	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官业批判论	121
第四节	殖产政策的转换	124
第六章	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论	129
第一节	变法运动的思想家	129
一、	康有为——最早的以“工”为中心的 思想	129
二、	谭嗣同——“通之象为平等”	135
第二节	变法运动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论	137
张謇——状元实业家		138
结 语		142

译 序

依田憇家先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几十年来从事日中友好与两国学术交流活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颇受尊重的著名学者。他与我国许多学者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并且共同培养学生。在他的研究室里，一批又一批地接待和指导着中国的访日学者及留学生，我即是其中之一。

1991年10月初，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的高访学者，应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赴早稻田大学作外国人研究员，在依田教授指导下，进行《传统经济观念与近代化》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之一）中有关中日比较部分的研究。依田教授在进行日中近代化比较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成就。

早稻田大学不仅以其淳正平实的学术风格享誉世界，而且具有悠久的日中友好传统。李大钊等人先后在此学习，因而早大对中国学者始终敞开友好的大门。依田教授是地道的“稻门弟子”即“早稻田人”。他的本科与研究生均在这里攻读，毕业之后一直在早大任教与研究。在他的身上，

充溢着早大的友好传统与平实风格，并时时处处可见他随和、平易与清新、儒雅的学者风范。

数十年来，依田教授一如既往地对中国充满美好的感情，曾三十余次访问中国，讲学交流、参观授课、主持答辩等等，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结下诚挚的友情，建立了深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而且，他的来访，大多是自费的。当我问他到过中国的哪些地方时，他一连讲出一串地名，有些地方他还去过多次。例如讲到延安，他伸出三个手指。他的随意与谦和，在他的装束外表上也充分体现出来。据说与他未曾谋面的中国学者迎接他来访时，常常找不到哪位是依田教授。他告诉我，在北京常有人向他问路，可他只能无奈地说：“我不知道”。我看到他70年代访华时的照片：棉帽、布鞋，仿佛是中国的一位下乡知识分子，而绝不会想到是日本名牌大学的教授。他还不止一次地介绍早大的平等风气，并拿出他的身份证，指着“教员”二字告诉我，早大的教师无论教授、讲师，都标示为教员。

依田教授的研究室、家中书房以及别墅中，到处堆满了各种书。他把自己的书斋称为“晚稻轩”，大意是说自己不如人，晚熟，是“早稻田”里的“晚稻”。他不阿权势，不附世炎，重在民间学术文化的交往活动。他还盛赞中国的陶渊明、蒲松龄等人，并且常常兴趣所致信手题诗。他刻得一手好印章，“乐天知命”、“吾唯知足”等印章，很能代表他的心境与想望。

依田教授称自己的爱好是读书和散步。不过，他的“步”会“散”到鹿儿岛或北海道去的。这与他的治学方法分不开——重实地考察是他的治学特征。凡是受教于他的人，恐怕都颇有体会。我很难忘怀同他一起去过的乡间学舍与信浓国遗址，而长野县小诸城怀古园里的日本著名文学家岛崎藤村纪念馆，则留下依田教授慷慨资助的遗痕。听说他常拿出自己的钱资助文化事业，也包括扶助中国学生。

我甚至想不出依田教授的书是如何写出来的。他要讲课，要主持学术研究、部会研讨，要辅导学生，要自己读书，还要“散步”。然而，他是那样的多产。别的不说，仅就我所知已译成中文出版的，就有《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简明日本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比较》（中国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关于中日近代化的比较研究，他已经从文化形态、国家观念、社会结构、统一市场等角度，撰发了一系列著述。本书是他的新成果，并且是上述系列研究告一段落的一个标志，收入1990年10月早大社科所纪念建所五十周年的论文集——《亚细亚的传统与近代化》。

从经济观角度比较研究中日两国近代化问题，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也是将比较研究引向深入的重要标识。我国正式列入国家级课题的相关研究，据我陋闻，大

概是社科1989基字328号项目，即我主持的《传统经济观念与近代化》课题，其中有关日本部分的研究，很有必要向日本学者请教，特别是向依田教授请教。当然，我们的研究与日本学者的研究，包括依田教授的研究，是不大相同的。我们主要立足于对中国前近代传统经济观念发展的轨迹与规律及其对步入近代化的影响与作用的考察，包括与日本的比较研究。这与对近代化进程本身的研究、包括比较研究，还是有差异的。自80年代末起，我们就很重视结合经济与文化来研究现代化问题，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91年2月13日，China Daily对我这方面的探索，进行了专访报导。在许多著述中，我都提到应当弥补以经济论经济、就文化谈文化的研究方法之不足；并且，经过几年“坐冷板凳”磨砺，我深感经济与文化的问题，不仅仅是“结合”起来研究的问题，而是应当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探讨传统学科划分在新的时代发展中的局限，从而开拓新的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研究领域与方法。例如，经济学以物质产品为其研究内容，而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必须研究的议题。也许恰恰由于精神产品不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创造这类产品的社会科学，无形中被视作不创造财富的行业。尽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已把“知识分子”摆到了相应的位置，但这更多的是指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严重的理论空白与实践误区是，“经济”这一概念，包括

研究经济的科学，并不研究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归着点——人，不把人的行为尤其是指导人们从事经济行为的意识观念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经济学家们在若干个世纪的努力中越发感觉到了这样的缺憾，而且在他们的理论中也涉及到了这些方面，例如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斯·韦伯。然而，像韦伯那样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的学说，更多的是作为社会学或其他非经济科学的研究而著称的。

唯经济思想与观念，是经济文化最核心的中介点。在我国，中国经济思想史是属于经济学的独立学科，这就为弥补理论经济学的缺憾准备了学科界域的有利条件；但是，如果单纯研究经济思想而不与社会历史进程尤其是现代化问题结合起来的话，经济文化的研究就没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因此，近年来，我们立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进而发展到经济观念尤其是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的研究，再具体比较东亚现代化模式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中日两国经济观的发展及其对两国现代化的作用与意义。这无疑将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无疑将在开拓“经济文化学”这一新的而又是十分必要的研究领域作出努力。但是，限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约束，很难断定这种努力的实效。尽管这种努力逐步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我也同一些国外学者进行过交流并应邀在一些大学进行过讲演，但我认为依然有很大的必要向临近的、相关的诸方面研究者请教、学习和借鉴。尤其是依田教授的谆谆教诲，校园旁那恬静的

咖啡店中的长谈，新宿御苑如茵的绿地上的漫步，研究室里认认真真的学习研讨，以及对日本各地的访问考察等等，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有着诸多的教益。

本书也是依田教授为中国学者讲课的内容，并正式授权由我们进行翻译。经作者欣然同意，此书将作为“经济文化丛书”的第一部作品问世。这对推动和深化我国的经济文化研究和“经济文化学”学科的逐步建立，具有“它山之石”的借鉴与参考意义。然而，我们的学识毕竟有限，尤其对日语文语以及候文文体并不很熟悉。是依田教授的热情鼓励，给了我们勇气，却也令我们不无忐忑。但是，我们愿将他的这部新作介绍给我国读者，除却想使更多的中国学者及时了解日本学术新成果，加深对中日比较研究这一热点的进一步认识之外，有计划地翻译和介绍日本有关学术成果，也是我们90年代系统性科研工作的一个方面，本书即是我们译作中的一部。

《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一书，字数虽不多，但其内容、所涉文献以及中译难度，都是非同一般的。我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查阅、参考和核对了许多文献资料，包括部分日文引文原书，并在中译本中进行了处理。尽管如此，许多问题仍不一定处理得好，尤其是将日本江户时代的文献译成中国的文言文，更是困难重重。于此，爱新觉罗·连湘教授和叶幼华教授的指导，对我们理解日本古文献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谨向两位教授衷心致谢！

本书共分六章，叶坦承译前3章，蒋松岩译就后3章，并由叶坦通校全稿。鉴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局限，书中译文的错误难免，恳请得到批评教正。

对于这部书，我们不敢妄加评论，相信读者自会有所认知。译作本着忠实于原作的精神，但在目录的章节安排上作了很小的调整。对于依田教授的研究，我所知道的实在很少；而我国许多前辈学者对此无论在了解与介绍方面，都做过大量的工作，读者还可以通过其他有关的中译本著述得到更深入的认识。关于日本经济思想史、特别是中日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目前我国也还比较薄弱。尽管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进行努力，也提出和发表了一些意见，但这显然还是不够的。我们相信，更多地介绍与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会有助益。对整个东亚地区而言，比较研究各国近代化中经济思想的作用与影响，系统研究各国的经济思想史，以及有计划地开展经济思想史的比较研究，也是东亚各国学者共同的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愿为之奉献绵薄之力。

最后，我想将自己归国前夕别赠依田教授的诗作为结句，并以之表达我们对他的诚挚感谢与美好祝愿——

一度金风逾扶桑，
三秋立雪稻轩堂。

稻轩堂：即前述“晚稻轩”。

潇潇泽化润桃李，
依依回眸胡桃庄。

叶 坦

1992年10月23日

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附记：

此书校样打出之际，恰逢作者访问中国，百忙中拨冗亲自校阅，并做了一定的删改，特此致谢。——译者

胡桃庄：依田教授长野县故乡别墅名“胡桃山庄”。

前 言

日本的经济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之外，在战前和战后曾经出现过两次迅速增长的时期。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日本周边各国以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都希图探究日本经济发达的原因。

对于我们日本的研究者来说，首先应当考虑到，近代日本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以朝鲜、中国为首的周边国家的牺牲之上的。进一步说，是建立在对这些国家的资源与利润的侵略和掠夺基础之上的。在现在的日本，对于急剧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反而有着一一种强烈的反省意识。这当中，有许多东西对其他亚洲诸国而言，并不希望去学习，反倒是亚洲诸国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勾起了我们的缅怀之情。然而，近代日本的迅速“发展”，倘或可称之为“值得探讨的世界历史现象”的话，那么，客观地阐明这一过程，应当说首先是我们日本的研究者的责任。

迄今为止，笔者已经针对上述问题，从各种角度对日

中两国近代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的尝试。日本的社会科学，从西欧社会与日本社会的比较研究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近代化”社会的是西欧（这是十分抽象化的“西欧”社会），因此，研究者们大抵将“西欧社会”作为一种尺度，以之作为探究日本社会发展史的客观法则，特别是作为世界历史共同发展法则的一部分，来探究日本社会的发展法则。

与此同时，深入探索全球规模的“近代化”法则，现在已成为必要。这是由于西欧社会也有其特殊的一面，如果依然循着以前那种把西欧社会的发展过程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研究中来，并把西欧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典型”来研究，这样的方法显然已经不大适用了。若仅以旧有的法则性原则看问题，而无视世界各国具体的发展过程的话，显见是不可取的。看来，采取根据对世界各国具体发展过程的研究而不断丰富世界历史的发展法则的方法，才是正确而必要的。

笔者曾经从近代国家意识、文化形态、经济过程、人民斗争等方面，对日中两国的近代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这里，则着重从两国的经济论方面，来比较研究两国的近代化问题。在封建社会末期和近代社会初期的经济思想领域

《关于亚细亚近代化的笔记》、《19世纪后半期日中两国的近代化》、《19世纪50～60年代日中两国的近代国家认识》、《19世纪末日中两国的近代国家认识》、《19世纪后半期日中两国的殖产政策》、《日中两国近代化过程中文化形态的比较》，以上均收入《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序说》一书中。

之中，包括了生产关系、财政、货币、物价以及其他的门类，这里主要讨论有关生产关系的变迁问题：第一，关于封建社会崩溃的经济认识。第二，对新的生产关系进行探索。第三，重点研究有关新生产方式的认识及其实现的要求诸问题；尤其是日本与中国在将欧美社会已经建立起来的大机器生产移植过来的这一时期中，谁是经营主体的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观点有很多，因而本书亦将予以特别深入的探讨。